

二民主義與新聞道德

王 洪 鈞

一、楔 言

言最易，任何人自襁褓階段，即能呀呀學語。言亦最難；不獨「立言」難，就是日常說話、傳事、議論、勸諫，甚至戲謔，何者不難！

傳播科學不斷證明無論用語言、文字、或圖畫，從事人與人際之溝通，均不易收到預期之效果。這僅是就傳播而言傳播。如果連同傳播的環境，一併研究，當可瞭解一言之既出，有效無效尚屬其次，重要者在其產生之副作用或反作用對社會將有何種影響！

我國文化，最重言責。

就一般人與人際之溝通而言，中庸有謂：「言順行」「行順言」。論語中，孔子亦說：「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君子欲訥於言」，「仁者其言亦訥」。這就是說，說難，說了而做不到，不如不說。

欲期其言論發生效果，更爲困難，而益見分寸。韓非子著「說難」，固在強調向君主進言之難。即使不是君主，亦不容易。孔子有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至於侍上，孔子則說：「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果然巧言、輕言、謾言、譏言、謊言，其不良影響足以損害他人人格破壞人際和諧，分化國民共同心理，動搖社會國家基礎，更爲言者之忌。孔子卑之爲「巧言亂德」，復發「一言僨事」「一言喪邦」。

此所以我國早從三代開始，幾千年來，姑無論仁君賢相，即是士大夫階層，也就是今日的高級智識份子，莫不重視言論，勝於兵戎，重視言責，一如道德。尤其是讀書人，每以言論報國言論濟世爲職志，更以「立言，立德，立功」爲三不朽。

由於言難，不言亦難，所以古之君子寧慎於言，而敏於行，並以其行而證其言。西方亦有諺語稱：「雄辯是銀，沉默是金」。就個人立身處世和待人接物而言，這種方式未嘗不可。但作爲民主社會的一份子，尤其是維護民主政治運作的大眾傳播工作者，雖然說難，還是要說，因爲這是言論自由的權利；固然要說，不忘說難，因爲這是言論自由的責任。

民主社會的一切皆以民意爲依歸。但民意的產生與認知却是極爲困難之事。雖然如此，人民對公共事務，皆能獲知，皆能產生明智的意見，而各種意見皆能有充份表達和討論的機會，總是形成正確民意的基本要件。早期希臘哲學強調理性，認爲決定應來自充份討論以後。這種思想不但孕育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觀念，亦教育人民知道在有關公共事務所作決定的後面，自己應負的責任。

無如西方經過千餘年之專制統治，復以活字印刷術發明後受到嚴厲之管制，爭取言論及出版自由乃成爲西人之主要奮鬥目標。英國爲出版自由而奮鬥的先驅密爾頓（John Milton），早於一六四四年便向英國國會提出「出版自由請願書」（Areopagitica），內稱：「在所有的自由中，請給我知道的自由，發表的自由，和根據良心而發的辯論自由。」此後，歐美國家各展開其爲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新聞自由的艱苦奮鬥。直到

十九世紀，才算徹底解除政治上的束縛，實現新聞自由理想。

但由於自由思想的氾濫以及自由權利的濫用所造成自由之害，幾與不自由並無二致。尤以十九世紀晚期迄今百年以來，傳播科技突飛猛進，報業兼併經營集中，激情主義及商業作風盛行，電視電影挾其聲光之效，固見其積極影響，另方面遺禍亦深且遠。有識之士，乃開始倡言社會責任，以制衡新聞自由。

若我國之言者，秉承史家之言論精神，固早已蔚為優良之文化傳統。即自遜清以來，多少才智愛國之士更循言論之途徑以遂救國救民之大志。革命報人于右任先生於一九一〇年九月九日撰民立報發刊辭有謂：「……不敢以訛言亂國是，不敢以浮言傷國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國民」。中國新聞學會於抗戰期間成立於陪都重慶，其宣言中有謂：「回顧清末咸同以來，滿政窳敗，外患侵凌，瓦解之勢已成，亡國之禍無日，當是時也，海內外之志士仁人，遠承數千年歷史文化之精神，近受明末諸大儒革命思想之陶冶，振復活之國魂，為革命而奮起，其武器無他，報紙言論是也。」

惟由於西方文化之長驅直入，傳播科技及經營方法固使近數十年我國新聞傳播事業得以蓬勃發展，若就言責與言德之傳統文化精神而言，則未見齊頭並進。西方重自由輕責任之新聞事業弊端，正見之於我國社會。若不自道德之途徑着手而謀三民主義新聞事業之建立，不獨無以實現國父創建民國之理想，更遑言對西方文化之迎頭趕上。因此，如何將國父之道德思想及三民主義之道德精神落實於我國之新聞事業，實為仁人志士之歷史責任！

二、國父之道德觀

三民主義之道德精神為何？自應求之於三民主義發明人國父孫中山先生之道德觀。國父是最重視道德的人，且視國民革命為一種順天應人的道德事業。民國十年，國父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復對日本青年強調道德為國家與人類社會存在之根本，而稱：「有道德始有國家，

有道德始成世界」。

國父之道德觀可稱以個人修身為本，擴及社會、國家、及整個人類；其所信仰之德目，純然繼承中國之道統，曰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更重視「禮義廉恥」四維之張。不過，以國父獻身革命之偉大精神而言，其中心之道德思想仍為仁愛！

國父於民國十年對滇贛粵軍訓話時曾對「仁」字作最透澈之闡釋。

國父說：「仁則不問利害如何，『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無怨矣。」又說：「中國古來學者，言仁者不一而足。據余所見，仁之定義，誠如唐韓愈所云：『博愛之謂仁』，敢云適當……能博愛即可謂之仁。」此所以國父多以「博愛」兩字書題中外友人。

國父復將「仁」之種類，歸納為三，曰救世之仁，曰救人之仁，曰救國之仁。國父認為宗教家「犧牲為主義」，「捨身以救世」，是為救世之仁；其如慈善家樂善好施，居於鄉而鄉稱仁，居於邑而邑稱仁，捨身以救人，是為慈善家之仁。國父認為革命家乃志士愛國之仁與宗教家、慈善家，同其心而異其用，專為國家出死力，犧牲生命在所不惜，「此所謂捨生以救國，志士之仁也。」

國父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正因為他們所推行者皆為仁政。國父認為他們能「上無愧於天，下無忤於民」是因為他們有兩種特別的長處：第一種長處是他們的本領很好，能夠造成一個良好政府，為人民謀幸福。第二種長處，是他們的道德很好，所謂「仁民愛物」，「視民如傷」，「愛民如子」，有這種仁慈的好道德。

國父提倡世界大同，亦主張用仁義道德制勝功利強權。國父說：「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國、美國有少數人提倡仁義道德；至於在其他各野蠻之邦，也是有這種提倡。由此可見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之文化。」

國父固為理想家，更為實行家；尤能將其獨到之創見，透過革命力行，而求其實現。國父在手著「中國革命史」中有謂：「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國父於道德之創見，而能見之於革命宣傳與實踐

者，筆者鄙見，約包括三項：

(一)互助合作：國父發明人類進化論，稱人類進化之時期有三：其一為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為人類進化之時期。

國父強調人類進化之原則與物種進化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由此可知國父視人類之互助行為，即在發揮其道德仁義之善性，以施行於社會國家，乃至天下。

合作亦然。國父說過：「我們人類的天職，是應該做些什麼事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群社會，天天進步。要人類天天進化的方法，當然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種宗旨，互相勸勉，彼此身體力行，造成頂好的人格……要人類有高尚道德，就在『減少獸性，增多人性』。」國父復主張「以有餘補不足」之「社會道德」，代替生存競爭，優勝劣敗。這就是互助合作的道德本質！

(二)服務犧牲：國父另「發明過一個道理，就是世界人類其得之天賦者，約分三種：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有不知不覺者」，「要調和三種人使之平等，則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萬人之務，造十萬人之福，所謂巧者拙之奴，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照這樣做去，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有平等，而人之服務道德心發達，必可使之成為平等了。」國父視服務為利人、犧牲；而稱：「重於利人者，每每至於犧牲自己，亦樂而為之。」國父勉勵教育界「期為全國人民負責任，非為一己搜利權……使我國之道德日高一尺」，又強調：「必須存犧牲自己箇人之幸福，以求國家之幸福為心志，社會始可改革。」是知服務犧牲者，亦為道德之實踐也。

(三)自由平等：自由平等原為西方文化之精髓，但國父之創見則認為必須兼顧個人自由與團體自由者，方為真正之自由；並主張「須給人民全體以生活之機會，並予以完全之自由。」此真正之自由與完全之自由，即

為國父順天應人革命奮鬥之目標，其道德之意義，至為明顯。

至於平等之真諦，國父不贊成西方「天賦人權」的假平等，而主張立足點的平等，是為真平等。國父並強調：三民主義就是為了「掃除一切不平等的事。如民族主義，即是掃除種族之不平；民權主義，即是掃除政治之不平，民生主義，就是掃除社會之不平。」

綜觀以上三點，喻為國父道德觀中之創見，或未有不可；亦見國父之道德觀在三民主義及有關遺教中，充份融滙體現。

三、三民主義之道德精神

國父繼承了中國的道統思想，並發明三民主義，使其發揚光大。這一歷程正是儒家道德理想主義的實踐。所以三民主義的道德精神，其實便是儒家道德理想主義，本忱惕惻隱之心的實踐精神。牟宗三先生曾說：他們（儒家）從家庭起，以至國家天下，都是在「盡性」「盡倫」中負起道德實踐的責任的。牟先生說：「盡倫即盡其性，盡其性即是在此踐仁。在盡倫盡性踐仁的實踐中，他們證實了忱惕惻隱之心以及此心中之天理，並且就根據這個心與理來成就他們的實踐。」牟宗三先生認為「在歷史上，儒家所表現的事實，歷歷在目。」從東漢以後，無論兩宋、以至明朝，建體立極的聖賢人物固不須說了，就是社會上一般的一命之士，稍讀幾句聖賢之書，便可立志不同；明亡，就是販夫走卒也能慷慨一死。三民主義的道德精神不但承襲了儒家這種道德的實踐，更能滙西方思想，使這種道德精神，發揚光大。因此，三民主義不是哲學，却包括了哲學的真知；不是宗教，却包括了宗教的真理。

先總統 蔣公說民族主義是倫理的文化，是由小康之世的「禮義以為紀，以篤父子，以睦兄弟」，進而至於大同之世的「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且必使「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者；民權主義是一種理性的自發的，而且是本然的民主思想，使民主成為「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民主，也就是責任的政治全民的政治；而民生主義則是「正德、利用、厚生、修齊、治平」的科學文化之建設。因此，蔣公在「國父一百晉一誕辰暨中山樓落成紀念文」中說：「國父發明三民主義，以繼承我中華

文化之道統爲己任，乃使我五千年民族文化歷久而彌新。」以繼承中華文化道統爲己任，力行實踐，正是三民主義的道德精神！

四、三民主義新聞事業之道德責任

台灣爲民族復興基地，爲我傳統文化之根據地，不獨實行三民主義，並以三民主義號召中國之統一。三民主義之精神原爲中華文化道統之實踐，已在前此詳加析述。然則凡百建設自須以三民主義之道德精神爲依歸。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之建設固應如此，文化與思想建設更不待言。尤以大衆傳播事業爲國家發展及社會進化之重要體系及推動力量，值此傳播科技突飛猛進，資訊時代已經到來，而國家社會於開放與多元中復亟需集中意志力量，如何在思想、制度、及政策之架構內，建立三民主義新聞事業之體系，使言者皆能負起先知先覺之道德責任，實爲當務之急者！

筆者早曾提出三個問題，與海內外君子謀，一曰如何確立三民主義之大衆傳播哲學及制度？一曰如何確立新聞記者之國士地位？一曰如何確立大衆傳播的自律制度？

第一項問題關係三民主義大衆傳播事業之建立至爲迫切。由於前述國父之道德觀及三民主義之道德精神中已揭櫫「仁民愛物」、「權力在民」、「以有濟無」、「互助合作」、「自由平等」、「服務犧牲」、「以先知先覺知後知後覺」之道德觀念，如何以此爲基礎，規劃設計新聞媒介之所有制，媒介使用者之權利及責任，以及資訊之公平分配種種，自須以高瞻遠矚之眼光，早日着手進行，以濟今日之急，更爲他日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樹立宏規。

第二項問題與新聞記者之道德責任實屬一體。就我國重言責言權之傳統文化精神而言，復遵照國父有關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三種人互相爲用，協力進行」及「聰明才力愈大者而服千萬人之務」，以及「以有餘補不足」社會道德之指示，則三民主義制度下新聞傳播者之地位倘非國師，必爲國士。筆者昔以孔子所稱：「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爲新聞記者之形象，認爲多聞屬於專業知識，直與諒則需要宗教家悲天憫人之精神、歷史家微言大義之精神，以及科學家求真求實之精神。

即以此條件養成新聞記者之國士地位，仍賴新聞教育，在職教育及新聞記者法加以體現，事實上，實現以三民主義建民國致大同之理想，新聞記者之道德條件，或需懸更高之錫的。

第三項問題則屬新聞道德之自修及團體實踐。歐美已嗜放任新聞自由之苦果，今日乃乞靈於基於社會責任之傳播制度與自律組織。若就文化觀點而言，此即西方文化已在東方文化之理念中找出路。我既實行三民主義，自應以最進步之自律制度及最具道德精神之新聞記者信條爲世界倡。已見「中國新聞記者信條」，揭櫫「民族獨立」「民權政治」「民生福利」爲新聞傳播工作者之基本信念，至爲高超而重要。筆者鑒於國父對道德之創見及對學者、教育家、及宣傳家之期許，或敢建議：服務奉獻之精神，悲憫利他的抱負，誠實正直之人格亦爲三民主義新聞傳播者所不可少。

五、結語

先總統 蔣公稱 國父發明三民主義爲孔子以後，再一次集中中國統文化之大成，「不惟使我中華民族，於長夜漫漫中，啓明復旦，亦使人類履道坦坦，共躋於三民主義之新時代」。則三民主義之實行，非惟中國道統精神之實踐，亦爲對世界人類應盡之道德責任。則三民主義新聞傳播事業，其教育之功能及道德之特性，必須與其他性能兼顧，或居乎其左，方足以迎頭趕上西方文化，實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並宏揚於世界之理想！

林政學

焦國模著

精裝本：二三四元 平裝本：一八〇元

本書對林業政策及林業行政之原則，乃至林業上之各種施政多所評析，並與美、日等國林業制度相比較，以明其得失。旁及我國林政史及現行林業法規。內容充實而極具深度。除可供大學教材之用外，亦足供林業學者及從業人員之參考。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